

被动对外开放与徐继畲的学术转向

杨国桢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鸦片战争后, 徐继畲的舆地考证从西北到东南、从陆地到海洋的转向, 是他尝试贯通中外历史地理、介绍海外新知识的联结点。利用中国海洋图书与雅裨理的口述相对接, 以中国海洋经验验证西方知识, 是《瀛环志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 是他研究世界史地的“副产品”, 含有冀望中国在海洋突围再起的深意。

关键词: 鸦片战争; 徐继畲; 学术转向; 海洋图书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2010)06-0051-07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福州刊刻出版。这是在鸦片战争后被动对外开放背景下, “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国海疆接触、交流的产物”。一个自幼在内地接受儒家文化教育, “一个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北方人, 来到有海洋意识的福建”^①, 是如何实现学术转向, 理解、运用沿海传统的海洋文化观念和话语, 来接受西方的世界观念和地理知识, 并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的? 这是解读《瀛环志略》也是深究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思潮的一个重要角度, 本文就此略加申述。

1 《瀛环志略》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对外开放, 沿海地方官员为办理通商事务而了解西方的产物。“与徐继畲差不多同时在广东、福建当督抚、道台的, 办过‘夷务’的, 和外国人有接触的, 也大有人在, 那么, 为什么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而别人没有写出来?”^②

传统的解释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徐继畲入觐时, “宣宗询及海外形势, 各国风土, 公具以对, 遂命纂书进呈”^③。也就是说, 他是得到道光帝的授权而写作的。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徐继畲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42年7月2日), 在福建“奉[四月二十八日]部文, 蒙恩授广东按察使。旋阅邸报, 乃知四月十七日已先授广东盐运使”。五月二十七日(7月5日), 上疏谢恩, 奏请陛见。^④七月十五日(8月20日), 道光帝收到此折, 批示“著来见”。是年十月, 徐继畲“在京恭聆圣训”^⑤。但道光帝谈话的内容, 未见诸官方档案记载, 徐继畲报告到广州上任的奏折, 仅说“叠蒙召见, 仰荷圣训周详, 无微不至”^⑥。对外也“未尝以语人”, 不知持此说者从何得知? 说者又云: “书成……未表进而宣宗升遐。”事实上, 《瀛环志略》定稿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 道光帝崩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 如果是道光帝授权, 何以“未表进”而擅自在福建巡抚衙门内公然开雕呢? 出版后, 何以吴文镛还要“瞩令再加修饰, 钞缮进呈”呢?

有论者说: “继畲能‘奏对甚悉’, 应已从事译著, 尚未成书而已。”^⑦ 其实, 徐继畲在此次陛见之前, 并无掌握海外形势、各国风土的条件。徐继畲于道光十八年(1838)初, 抵福建延建邵道任。

作者简介: 杨国桢,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史、社会经济史、海洋史研究。

① 德雷克(龙夫威):《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任复兴译, 北京: 天津出版社, 1990年, 第16页。

② 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阮芳纪序,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序言第10页。

③ 杨笃:《松龛先生传》载《松龛先生全集》山西地方志、《清史稿》和其他一些研究论著采纳了这一说法。

④ 徐继畲:《上颜鲁制军书》, 军机处录副奏折, 03-2721-0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 03-2732-0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 03-2728-0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⑦ 陈存恭:《徐继畲事略及其瀛环志略》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第8页。

但他接触海洋和涉外事务,则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时因闽浙总督邓廷桢、福建巡抚吴文裕的推荐,从闽北“调署汀漳,驰驱海壖”^①。甫抵漳州,适值英军进犯厦门,“此时形势,其危迫甚于泉州,海澄固在虎口之中,郡城亦争呼吸之际”^②,他奔波于漳州与海澄之间筹划防守。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首次至厦门,谒见闽浙总督颜伯焘。六月,再至厦门,留旬日。他自称:“一年以来,驰驱海岸,日不暇给。”^③七月初十日(8月26日),厦门失守,“其后寇氛益亟,庄年(兴泉永道刘耀椿)在同安,余数以军事往会”^④。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怡良任闽浙总督,令徐继畲兼任粮台,驻泉州。六月,离泉州。这段时间,自称“本书迂,安知兵事”的徐继畲,处理的还是海防急务,他感受到英军“非大挫其锋,其势未有所止,而水战非我之所长,仓卒无制胜之术”,“逆夷船坚炮利,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即在海岸安炮与之对击,亦是下下之策”,而“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地为马头,岂能听之耶?”苦无良策,只好“竭力尽心,听天由命”,随时准备与此土共安危,“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劳悴不堪言状”^⑤。哪有心情和精力去探访海外形势和各国风土呢?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二十三日,徐继畲抵广州,^⑥但“甫及三月”,便于四月二十六日奉两广总督祁行知(四月初二日)命调福建布政使,五月初一日(5月29日)奏请进京陛见,^⑦但未获批准。他与黄恩彤、梁廷枏、潘仕成交往,或许感到了了解外情的需要,但职位的变动,不容他有著书立说的想法。徐继畲于闰七月初二日抵福州,接任福建布政使。九月十一日,厦门开市。十月二十三日,道光帝谕命他驰往厦门经办通商事务。^⑧是时,他对外部世界还是陌生的,而“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于咨询”。恰巧十二月初八日(1844年1月27日),在厦门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里布(H. Grubble)商谈开口事宜时,英方译员、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 Abeel)“能作闽语”,即闽南话,询问外国问题,多能解答,是一个“西土淹博之士”。遂请其提供资料,雅裨理随即送上地图册子和其他书籍,引起徐继畲的兴趣,“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详之,粗知各国之名。”^⑨和雅裨理的相遇,成了他决心著书立说的直接诱因。而雅裨理乐意提供资料和咨询,是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这是同一时期管辖五口通商的其他督抚、道台没有遇到的机遇。

其次,厦门是明清之际兴起的对外贸易港。郑成功时代,以厦门为根据地,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竞逐海上,掌控东西洋贸易。虽受禁海迁界的破坏,但清初以来,仍是福建通洋口岸,继续与南洋贸易,移民台湾和南洋不断,成为海外知识和情报的重要来源地。著名的海洋图书,如《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台湾外纪》等均出自厦门附近地区人士的手笔,利用方便。外国地图和外国人所写汉字杂书,也在此地流通,易于搜集。这两类海洋图书是从内陆到沿海的官员了解西方历史地理新知识的桥梁。所以,徐继畲“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尺馀,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汉字杂书数种”之时,《海国闻见录》等已是案上备用之书。^⑩此外,厦门航海人员很多,到过南洋的不少,可供海洋知识和南洋知识的咨询。这三个客观条件,当时其他通商口岸难以具备。即使是获得外国地图和书籍更为方便的广州,要寻找福建海洋图书

① 徐继畲:《谢刘次白中丞保荐书》,载《徐继畲集》第1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② 徐继畲:《致某方伯书》,载《徐继畲集》第1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③ 徐继畲:《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载《徐继畲集》第3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④ 徐继畲:《别刘庄年观察序》,载《徐继畲集》第1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⑤ 徐继畲:《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载《徐继畲集》第1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03-2728-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03-2732-0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59页。

⑨ 徐继畲:《瀛环考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⑩ 徐继畲:《瀛环志略》点校本,载《徐继畲集》第3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和到过外洋的航海人员，也并不太容易。

第三，徐继畲有舆地考证的学术根底和学术兴趣，有助克服学术转向的阻力。“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用的是考证方法，本已驾轻就熟，故能“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正如陈庆偕在《瀛环志略跋》中所说：“得泰西人所绘地图，反复询译，参以史录所纪，订其舛误”，“而公之不惮旁搜博采，积岁月以成此书者，非公之好奇，正公之精于穷理也”。这种学术功力和毅力，恰巧是同时期办理通商的其他督抚、道台所缺的。故有心人如鹿泽长，“曩尝监司浙东，历沿海诸郡邑。近复奉檄来闽，因得从先生之后，襄理通商事务。时与泰西诸国人相往来，亦欲有所采择，成一家之言，而才有未逮，靡所取裁”。

2

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初徐继畲再至厦门，已有写作《舆图考略》的计划，从外国地图册中摹出草图，与雅裨理“暇日引与晤谈”。每张图后作《图说》记录雅裨理意见，摘抄中国图书有关西域和南洋的地理资料，相互对校。“三月间赴厦门……因米利坚国夷船有赴天津之信，故自厦等候，相机劝阻。驻厦两旬……于四月十九日（6月4日）回省接印。”^①和雅裨理又作长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五月，兼署福建盐法道。六月底交卸。他利用这段时间加以整理，七月写成初稿二卷，2.8万字，地图28幅。识云：“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寰考略》。”其中除《西域闻见录》外，都是近人所著海洋图书。所谓泰西人《高厚蒙求》一书，即嘉庆十二年（1807）至道光九年（1829），江南云间徐氏刊刻、徐朝俊纂辑的《高厚蒙求》初集至五集。其二集《海域大观》介绍世界地理，采辑泰西之学如艾儒略《职方外纪》等成编，但这套书不能说是泰西人所著。从上述书目可知，徐继畲的研究门径主要是以中国海洋图书与雅裨理的口述相对接的。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1845年4月23日），因刘鸿翱病免，徐继畲接署福建巡抚。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回布政使任。公余仍继续搜求增补。十一月初七日（12月23日），接旨调广西巡抚，奏请觐见。旋束装北上迎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1847年2月21日），在杭州接旨调福建巡抚。二月初一日（3月17日）在闽北延平府接任，初六日（22日）到福州。六月十三日（7月24日），因刘韵珂病假，接署闽浙总督。秋，回福建巡抚任。至次年，书稿经数十次修改终告完成，定名《瀛环志略》正文近15万字，地图38幅。“陈兹圃方伯、鹿春如观察，见之以为可存，为其删订其舛误，分为十卷。”八月，作序付梓。

《瀛环志略》以图为纲领，专详域外。该书突出的特点，正如凡例所述，一是“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凑合而敷衍成文”。二是“南洋诸岛国葑闽閩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两地，言之较详。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纪载。然地名国号，展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转不如近时闽粤人游南洋者所纪录为可据。此书于南洋诸岛国，皆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其沿革于后”。近人研究兴趣专注于前者，对后者略而不究。其实，后者反映了徐继畲的舆地考证从西北到东南、从陆地到海洋的转向，是他尝试贯通中外历史地理、介绍海外新知识的联结点。

鸦片战争失败，来自海洋的威胁对士大夫的震动还只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被动对外开放，促使他们关注中国海洋的命运，记述清代传统海洋活动和海外知识的图书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蕴香编刻《域外丛书》道光二十三年（1843）郑光祖编刻《舟车所至》的举动。徐继畲在写作《瀛环志略》的5年间，参考了26种中国官私文献。他认为，“史籍官书，半由采辑，仅可志其沿革，不能据为典要”，进而从中国人走向世界形成的海外知识中发掘资料。称引的私家文献，面向海洋的居多，有《海国闻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汎海小录》《方广十洲记》《中山

^① 徐继畲：《致服先堂兄书》，载《徐继畲集》第1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志》《海岛逸志》《海录》《安南纪程》《吕宋纪略》《簿海番域录》《台湾外纪》等。

利用这些海洋图书，首先是选择译名的需要。“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历史上，中国人出洋贸易和移民海外以闽粤人为主，两省方言各异，以汉文书写外国地名、史事，便有广东话或闽南话音译的不同。其中一些约定俗成的译名，如埔头，系英文 port 的闽南语译词，在华侨社会中通行，被闽粤沿海民众和官方接受，就不轻易更改。国家或地区译名不同，即“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如宋卡，引《海录》注：“一作宋脚，闽音谓脚为卡，读如克上声”。又如孟买，注：“一作网买，粤东称为港脚”。“东南洋诸岛，陈资斋《海国闻见录》言之最详……漳人王柳谷所著《海岛逸志》，言噶罗巴事甚悉，诸岛地名，与《海国闻见录》多不同……尝令雅裨理译出地名，则与陈、王两书又不相合。盖以闽音书番语已多恍惚，而欧罗巴人又多随意命名，不尽系各岛本名。今就两书参互考之，得其大略，然难保其无舛误也。”如吕宋较南一岛，《海国闻见录》称为纲巾礁脑，似即欧人所云民答那峨，《海岛逸志》称为洞仔低者，究亦未知其是否也”。

其次，是以中国海洋经验验证西方知识的需要。中国海洋图书对东亚、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叙述十分丰富，虽有不少耳食之谈，但其中亲历者的记述，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加以引用，并做出考证。如卷一《亚细亚东洋二国》对日本的叙述，“节采《海国闻见录》，因作者“泉州陈资斋提军（伦炯）少时尝附商舶游日本，言其风土甚悉”。而“西洋人海图，将日本三岛列朝鲜以北，系属错误。彼市舶罕到东洋，就所传闻者，以意为之耳，兹据《海国闻见录》更正之”。琉球自明初为中国属国，从福建入贡，成化以来历次册封使均由福州开洋赴琉球，留下记录，而西方与琉球尚未接触。所以书中引用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海山）在琉球收集资料写成的《中山志》（即《琉球国志略》），述其沿革，并以“明初入贡，太祖赐以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贡职甚谨，封舟频往”，万历间日本萨摩藩入侵，虏去中山王尚宁，“王被执不屈，倭送还复国，由是复修贡职如常期”的往事，发表评论：“其国比之南澳、平潭差大，而不及台湾之半，盖沧海之一粟耳。然累世效贡职，受正朔，遂为东海藩臣，比于朝鲜、交趾。国贵自立，岂不信哉！”卷二《亚细亚南洋各岛》“南洋各岛，泰西人所绘图最为审细，而其说不甚详，讳见地名，亦多舛异。历考诸家杂说，各有短长。陈伦炯（资斋）《海国闻见录》得其大致，而方向界址大半迷误。其所云水程更数，亦多舛错。王大海（柳谷）《海岛逸志》言噶罗巴事最详，彼侨寓其地者十余年，躬所履览，自不诬也。其余半涉影响，惟谢清高《海录》于暹罗诸属国暨婆罗洲、苏门答腊两大岛，缕悉言之，确凿可据，盖曾游览其地者。其余各岛，则有乖有合……今就泰西人原图，博采诸家之说，又询之泰西人，及厦门曾历南洋之老舵师，参互考订，约略言之，不能保其必无舛午也。”

清代闽粤人游南洋所记录的海洋图书，融合了中国文化大传统（农业文化）和小传统（海洋文化）的观念和话语，贴近沿海人民的社会心理，比外国人的汉字杂书用语更易于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徐继畲加以吸收和发挥，使他的著作突破了翻译西书的范畴，把海外的史地知识与中国沿海地区传统的海洋表述衔接起来，从而“在无意中缩短了中国和外部世界在文化上的距离，缓解了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尖锐程度”^①。这是《瀛环志略》写作时得到福建官员的支持，最终为中国社会接受，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原因。

3 徐继畲在办理通商事务、研究世界史地的实践中，重新“发现”中国的海洋史，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构建中国的话语权。这是他写作《瀛环志略》的“副产品”，在当时和过去的100年间，并不为人们所看重。在主动对外开放30年的今天，重读这本书，不能不令人感受到徐继畲的舆地考证从西北到东南、从陆地到海洋转向的智慧之光。

^① 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中国人向海洋发展的历史悠久。徐继畲指出：“华人入倭，自徐福始，其遗民年久繁衍，遂散布于通国。”“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纪载。”“西北之耀武功，始前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为唐人。然唐时之番舶，亦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岛国。王涯之胡椒八百斛，故南洋产也。”“南海诸番之通中国自汉始，而岭南之榷番税自唐始。唐以前之通番，不过求珍异之货，夸王享之仪，其重在贡。而唐以后，则榷其货税以益国用，其重在市。”明确地描述了中国对外交流通道即“丝绸之路”从陆地向海洋的转变。

从南宋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的传统海洋时代。卷一至卷四，多处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指出：“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明成祖好勤远略，特遣诏使，遍历各番岛开读。于是诸番岛喁喁内向，效共球者数十族。”他把这段历史与刚学到的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相比较，认为中国海上活动的范围仅至“小西洋”（印度洋），宋元“盛称波斯胡。波斯即今之包社，在印度之西，中土统谓之小西洋”。“明初，郑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称为西洋尽处。彼盖由印度洋驶入红海，遂以为海尽于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所谓大西洋也。”所以，“虽云盛事，抑未免夸而滥矣”。他的海洋视野从传统的东西洋扩大到全球，从而得到前人所未阐发的新认识。

他没有也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人走向海洋的原因，用“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来理解和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指出：“由唐至明中叶，闽广之所谓番舶者，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岛国，非今日欧罗巴之番舶，亦无所谓鸦片毒物也。然南宋时已有钱币漏泄之忧，前明时已有奸民假冒之弊，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欤？”他把前人指责海洋贸易的弊端视为“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给予宽容，可知他已从固有的陆地思维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徐继畲观察到“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是“古今一大变局”。明代“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航海东来，蓄谋袭夺，番族愚懦不能与较，于是吕宋群岛遂为西班牙所据，而苏门答腊以东大小数十岛，处处有荷兰埔头。万历后，诸番国朝贡之舟无复抵香山澳者，以为远人之日久寝疏，而不知其流离琐尾，地已为他族有也。自泰西据南洋诸岛，城池坚壮，楼阁华美，市廛繁富，舟楫精良，与前此番族之荒陋，气象固殊，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昔之南洋，为侏獠之窟宅，今之南洋，为欧罗之逆旅。履霜冰至，岂伊朝夕？事势之积渐，盖三百年于兹矣”。

西方向亚洲扩张，而明清王朝却从海洋退缩，中国人的海洋活动优势渐失，但也并非无可记之功。他从海洋图书中发掘材料，予以阐扬，并借鉴历史，反思当前对策。主要有以下两大亮点：

1. 叙述了闽粤人下南洋的史实和贡献。明中叶后，“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在吕宋，“华人贩吕宋既伙，留居洞内，名压冬，积至数万人”，虽遭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其后留者复成聚落。到清代，“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噶罗巴“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闽广之人留寓者生齿日繁”。“闽广之海船，大小西洋之夹板，每岁往来以千百计……闽广之民流寓其地者，以数万计。荷兰择其贤能者为甲必丹，专理华人词讼。”“漳泉之人最多，有数世不回中华者……其寄居未久，及时往来者，服食语言仍华俗……为甲必丹者，皆漳泉人。”北胶浪“南北限以柵，华人萃处其中，俗呼为八芝兰”。新加坡，“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吉利有之……闽粤贩洋之船……亦时至……闽广流寓万余人”。檳榔屿“居民五万四千，闽广人居五分之一”。道光十五年（1835），蔡廷兰从金门渡海回澎湖，遭飓风飘至安南广义，次年从陆路归国，“自广义至凉山，历安南十四省。所至之地，必有闽粤人聚处，各有庸长司其事。闽则晋江、同安人最多，盖不下十余万也”。海外移民是国力的延伸，西方海洋势力来到南洋，不能不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和贸易网络。徐继畲评价：“南洋者，亦七鯤、珠厓之余，而欧罗巴之东道主也。”可惜他们没有得到明清官府的支持和保护，而且当做非法活动加以禁止，以致“今南洋、印度诸岛国，皆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地则犹是也，而主者非其旧矣”。

在西方殖民统治下, 南洋华侨华人的存在和发展, 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还是有利的。他指出, “当台湾未开之前, 吕宋之米时时接济闽中。近厦门通商, 吕宋之米复至, 较之珍奇玩好, 其为利益也大矣” 就是一个实例。他同情海外移民的处境, 希望他们能闯出新天地, 如“近年粤之嘉应州人, 入(婆罗洲息力)内山开矿, 屯聚日多, 遂成土著……近已逾数万人。择长老为公司理事, 谓之客长”。即嘉应人罗芳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建立华人自治的“兰芳公司”。他表示赞赏: “倘有虬髯其人者, 创定而垦拓之, 亦海外之一奇欤?”

2. 颂扬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击败荷兰的功绩 “荷兰航海东来, 至中国之东南洋, 据爪哇海口(即噶罗巴), 迤东迤北各岛国皆建设埔头, 通东西七万里之海市……明季, 尝以兵船扰闽浙, 垦台湾而据之, 后为郑氏所逐。”崇祯六年(1633)九月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 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东渡收复台湾, 是中国海洋史的光辉篇章。徐继畲把这段史实写入卷六《欧罗巴荷兰国》指出: “成功悉锐渡海, 夺鹿耳, 据安平, 相持一年, 荷兰大困, 成功乃纵之去。由此绝意中国, 不敢复觐片土。先是郑芝龙受抚后, 尝以小舟焚荷兰三艘, 厥后成功扼之于台湾, 几致片帆不返。以彼横肆如鲸鲵, 遇郑氏父子而弱焉, 亦足为远夷侵凌中国之炯戒矣”。

他特别重视郑芝龙火焚荷兰船的经验, 认为可供当前抵御外侮的借鉴: “郑芝龙焚荷兰船, 见闽人所著《台湾外纪》。其书虽小说, 而事多实录, 非尽荒唐……他书言火攻者纷纷, 有谓用千百木筏积薪, 顺风潮而纵之者, 有谓锁千百小舟积薪, 舫港面而围之者, 大约皆江河火攻旧说。否则, 攻海盜旧说, 施之夹板, 凿柁甚矣。海面宽阔, 夹板皆相地散泊, 近者相隔一二里, 远者三四里, 木筏小舟虽多, 岂能塞满汪洋, 如墙而进? 又岂能引针拾芥, 无端使之相著? 此自焚舟, 何与彼事? 不如芝龙之钉船, 事虽难, 而尚有实际耳”。这是颇具洞察力的见解, 现已得到荷兰原始档案的佐证, 是中国海战史上成功的案例。这一见解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对俗传各种火攻“奇策”加以考证, 并向水师官兵查询后得出的结论:

俗传红毛船最畏安南, 不敢涉其境。其人善于泅水, 遇红毛夹板, 则遣数百人背竹筒, 携细缕, 没水钉于船底, 从远处登小舟牵曳之。俟其搁浅, 乃火焚而取其货。又或谓安南人造小舟, 名曰轧船, 能攻夹板船底, 故红毛畏之。以今考之, 皆不甚确……商船入安南内港, 土人皆用小船系绳牵引, 乃虑其搁触礁浅, 藉为向导, 即中国各港之引水船。反用之以碎敌船, 理或有之, 惟没水而钉船底, 则事涉杳茫矣。至轧船之制, 曾有绘图仿造者, 施之海面, 仍无异常船。耳食之谈, 施之实事, 往往凿柄, 正不独此一事也。(卷一《亚细亚南洋滨海各国》)

凿舟之说, 自来以为奇策……尝以询之寥升堂(振彪)提军。提军云, 此技余少时尝学之未成也, 而知其梗概。凡人入海水必闭目, 否则为咸水所浸, 目且盲; 必闭气, 否则流随吸收, 转瞬而腹彭亨。年少力壮者闭气稍久, 亦断无逾刻许者。其能不浮不沉, 恃手足之运动, 运动少停则随波涌出水面, 断无在水中尚能施力运斧之理。且海水波浪最劲, 愈深愈劲, 能浮江河之水者入海水则败, 能浮内港之水者入大洋则败。善水之人, 在大洋落水得片板可不死, 若徒手浮沉大浪中, 力尽气微亦未有一死者。此技即使至精, 断不能化身为鱼鳖。世俗所传大半得之耳食, 资谈柄则奇创可喜, 竟欲施之实事则愚矣。又守备吴金魁(水师勇士, 杀海贼无算, 为贼伤毙, 得旨优恤)亦尝习此技。余问之, 亦云然。(卷七《欧罗巴佛郎西国》)

徐继畲关注海外移民和颂扬郑芝龙、郑成功, 是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 他在书中表达出来, 含有冀望中国在海洋上突围再起的深意。这两大亮点, 反映了徐继畲海洋意识的感悟。这种认识, 是他在内地(包括闽北)生活时绝对体会不到的, 也是不接受海洋图书启蒙的沿海官吏体会不到的。不过, 他的海洋史论述不完备, 甚至出现失误。他把明代嘉靖年间在闽浙出没的葡萄牙人视为荷兰人, 是一大败笔。在卷六《欧罗巴荷兰国》中, 他说: “胜国季年, 闽浙两洋, 时见侵轶。尝踞舟山(定海道头地方, 尚有红毛码头之名), 毁普陀(普陀岩有万历年间宫塑佛像, 荷兰以巨炮摧之, 收其宝藏而去), 鼓棹月港(即海澄县, 从前海港深通, 大船可抵城下, 荷兰船时来游奕。后港渐淤浅, 乃

移市舶于海门，海门又淤，乃移于厦门），寄迹澎湖（崇祯三年，荷兰据澎湖，闽抚南居益以楼船航海击之，荷兰遁去），卒乃据台湾而有之，彼时概称为红毛，即荷兰也”。把荷兰“寄迹澎湖”前葡萄牙的侵扰闽浙，归于荷兰，是对历史的误读。又如卷七《欧罗巴葡萄牙国》评论说：“粤东之居夷，自葡萄牙之居澳门始……当事利其居积货宝，便于供办。又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一枝暂借，无足重轻，非必贪其五百金之利也……诸夷之浸淫狎熟于粤东，则由澳门为之权舆也。林富一代名臣，而谋国之疏若此。语云‘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可不慎哉！”林富在嘉靖八年（1529）任广东巡抚时上通市舶疏，主张“凡舶之来，出于《祖训》《会典》之所载者，密询其真，许其照旧驻割；《祖训》《会典》之所不载者，如佛朗机者，即驱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军擒捕”^①。林富的开海主张是把佛朗机即葡萄牙排除在外的，不会造成葡萄牙入居澳门的后果。徐继畲的评论似乎是把荷兰视为佛朗机，把葡萄牙归于“许其照旧驻割”一类，因而产生误判。这是初涉海洋史领域，搜集阅读闽粤海洋图书不足所致，在近代开眼看世界初期难以避免，但不影响徐继畲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的历史贡献。

4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探求西方知识，自林则徐始。徐继畲未与林则徐共过事。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在《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中首次提到林则徐：“上年粤东查办烟土，焚其鸦片两万箱，遂启兵端。上年夏间突陷浙之定海，旋赴天津递呈诉冤。圣主意在怀柔，递两督之职（林少穆、邓嶰筠），命琦相赴粤查办”。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据外人报导，当时已有抄本流传，徐继畲是否见到，不得而知。他从魏源的《海国图志》间接地参考过《四洲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有两处引用，即卷三《亚细亚五印度》：“道光二十年，粤东译出英人新闻纸，有英军攻阿付颜尼，俄罗斯约木哈腊欲取阿付颜尼之说，意在争北印度也”；卷三《亚细亚西域各回部》：“道光二十年，粤东译出英人新闻纸（即月报），有云，五月十四日，接印度来信，论及俄罗斯欲攻打印度事。”虽未提及林则徐之名，实出于林译《澳门七月二十五日（即中国六月二十日）新闻纸》：“印度五月十四日（即四月十三日）新闻纸内云：我等接到朋友付来之信，讲及俄罗斯国家之狡诡……俄罗斯欲攻打印度之事”^②。从现存林则徐信札，可知收到徐继畲两封来信，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1849年1月29日）林则徐复徐继畲书云：“八闽六诏，相距迢遥，竿牍多疏，葭思甚切。日昨获披琅翰，辱承绮注因时，正拟泐具复笺，适又瑶华远逮，迭纫记注，益切铭镌”^③。徐继畲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接任福建巡抚，按理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节前后双方应有官场贺年书信酬应，不知何故没有记录下来。徐继畲与林则徐见面，迟至道光三十年四月（1850年5月），虽然“迨六七月来，为夷务议论未合”^④，不与相谋，但不能否认他们在探求西方知识上的相通。

《瀛环志略》以介绍外国史地、探求新知奠定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这一结果是与徐继畲从陆地到海洋的学术转向分不开的。在后来的100多年间，许多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也经历过这种转向，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接，完成外国文化话语中国式的表述，赋予其新的内涵。研究徐继畲从陆地到海洋的学术转向，不仅为《瀛环志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破解现代变革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所遇到的中外文化摩擦、文化冲突，建设中国与世界互补的和谐文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刘 莉

① 黄佐：《泰泉集》卷12《代巡抚通市舶疏》。

②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9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1-293页。

③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8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④ 林则徐：《致沈葆楨》载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8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